

上 篇

1. 宣扬“皇国史观”的战前日本教科书

在日本，关于教科书问题的争论，实际是对战前及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教育及皇国史观的评价的争论，是对日本是否承担战争责任和是否反省的争论，是对日本战后如何接受历史教训走什么样的道路的争论。也就是说，现在的教科书问题与历史认识问题有密切的联系，与战前和战争中的教育及教科书有直接的联系。

日本战前的教科书，特别是自明治维新后“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以来的日本的天皇制教育，与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乃至法西斯道路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如果不了解日本战前教科书与天皇制教育的情况，很难认识当代教科书问题的严重性。

“教育敕语”——天皇制教育的基础

在日本，只要谈到战前的教育，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就像只要谈到战前的日本军队，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天皇的“军人敕谕”一样。因为“教育敕语”和“军人敕谕”都作为天皇的最高指示，强制向社会推行，给日本社会以极大的影响。

那么，“教育敕语”是如何产生的呢？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建立了以天皇作为主权者对全国发号施令的君主制统治形态，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天皇一人，这就是近代的天皇制。但是，天皇制的建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在其地位确立还是在其权威巩固的过程中，都遇到了种种障碍。所以同任何一个专制政权的建立一样，明治政府在建立后就一直把确立和保证天皇的权力地位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明治政府在推行中央集权化政策的同时，特别强调天皇的权威是“万世一系”的，规定天皇的统治就是日本的国体。但是，仅仅用这样的一般手段仍然难以征服民心。为了证明天皇制国体的合理性，明治天皇的御用文人制造出了由一整套理论构成的历史观，说明天皇的统治是“万世一系”的，有悠久的历史，也有无穷的未来。这就是“皇国史观”，或者说就是日本的“国体”论。

“皇国史观”具体说来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大义名分论”、国粹主义和排外主义。“大义名分论”是对日本人行行为的约束，要求他们必须遵从神格化天皇的意志，作为臣民要随时为天皇奉献一切乃至生命；国粹主义是对日本人的精神进行内在的培养，要他们把一切理念都建立在天皇制下的“大日本”一切都是优秀的基点上；排外主义则是对日本的精神进行外在的鼓动，让他们相信大和民族以外的民族都是劣等民族，都是日本的威胁，把日本的对外扩张建立在民族差别意识的基础上。

日本的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皇国史观”不能只限于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应成为日本国民的普遍的意识 and 信念。而做到这一点，只有靠教育，特别是从儿童开始的小学和中学（在日本，“中学”的概念指初中，高中称为“高校”）教育，让日本人从儿童和青年时代起就养成承认天皇为最高权威的“皇国史观”。当然，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科书问题，重要的是编写与“皇国史观”相适应的教科书。

1889年2月11日，正是日本的“纪元节”。所谓“纪元

节”，是日本神话传说中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日本政府颁布了确立日本天皇的绝对主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或者被称为“明治宪法”。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第一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天皇乃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第四条）；“天皇统率陆海军”（第十一条）等。接着，在第二年，即 1890 年，日本政府又以“圣旨”的形式发布了天皇关于教育的指示，从此便诞生了统治日本社会思想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教育敕语”。其实，严格来说“教育敕语”是由天皇的近臣们起草的。

“教育敕语”立足于以天皇为顶点的日本大家族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体系，即“家族国家观”，提出日本人必须无条件遵从天皇和为天皇献身的国民道德规范。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旦有事发生，必须以义勇奉公的精神，保卫天地无限的皇运”，“在发生战争时，必须为天皇尽忠尽义，保卫国体”。也就是说，“教育敕语”是要日本人从小就开始培养忠实于天皇，为天皇献身的精神，也就是说，“教育敕语”及其确定的“皇国史观”决定了日本教育的基本方向，当然也确定了日本教科书的编写方向。

“教育敕语”公布后，立即被当时的日本政府用行政手段加以神化和推崇。

1891 年，“教育敕语”被制作成复写本，用豪华的卷轴装裱，发送到日本全国各中小学校，同时发送的还有天皇和皇后的照片，当时被称为“御真影”。“教育敕语”和“御真影”被视为天皇教育制及天皇和皇后本人的象征，在各学校都辟出专门的地方供奉，那一地方被称为“奉安殿”。在重要的节日，各学校举行正式的仪式时，将“教育敕语”和“御真影”从“奉安殿”中郑重地取出来，摆放在显著的地方。仪式开始，由校长在“御真影”面前宣读“教育敕语”，全体师生高呼天皇、皇后万岁，向“御真影”鞠躬行礼，唱歌颂皇室的歌曲“君之代”。那时，日本

的军人必须在军旗面前背诵天皇制定的“军人敕谕”，以表示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学校的仪式与军队的仪式相同，可见面向学生的“教育敕语”与面向军人的“军人敕谕”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1894 年，日本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以后又同俄国进行了争夺中国东北势力范围的日俄战争，迅速向中国大陆扩张。为使日本国民全力支持配合对外的侵略扩张，贯彻“教育敕语”的精神，在日本的贵族院和众议院都提出了将日本的教科书“国定”化的主张。

国定教科书

这里我们要谈日本战前的教科书问题。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初期，教科书的编写、发行和选择使用都是自由的，政府不加干预。也就是说，当时日本的学者和教师可以自己编写教科书，学校和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使用教科书。直到 1875 年，日本政府还奖励民间编写教科书。当然，这种状况是近代教育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的表现，并不说明日本教育的开明。随着明治政府统治的加强，特别是“教育敕语”公布后加强“皇国史观”教育的需要，日本政府开始考虑改变教科书的编写制度。

1903 年 4 月，日本政府修改了“小学校令”，规定“文部省对于小学教科书拥有著作权”，这就是说，小学的教科书必须由文部省编写，而所有小学必须使用这种由文部省编写的教科书，不能再选择其他的教科书，因此也阻止了教科书的自由编写。这种由文部省代表国家编写的教科书就是所谓的“国定教科书”。学校只能使用“国定教科书”而别无选择的教科书制度就是“国定教科书”制度。当时，这种“国定教科书”的印刷权只给予三

家出版社，那就是日本书籍、东京书籍和大阪书籍。显然，实施“国定教科书”制度对于贯彻“教育敕语”是极为有利的，这说明，日本政府开始以行政手段介入历史教育，向国民强制灌输“皇国史观”。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攻击了在朝鲜的仁川和中国东北旅顺的俄国舰队，9日，日本陆军在仁川登陆开向汉城，10日，天皇宣布与俄国开战。在日本发动对外扩张战争的时候，迫切需要动员国民积极参加，需要保证天皇政策的实施。也就是在发动战争的两个月后，第一期日本的“国定教科书”开始使用了。

当时，被确定为“国定教科书”的有修身、国语、日本历史、地理、图画和习字。其中“修身”来源于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是以培养国民道德为目的的学科，是政治性很强的一门课程。日本政府使用教科书培养国民的忠君爱国精神，也主要是靠“修身”课进行，所以“修身”课本的编写在教科书“国定”过程中是最受重视的。需要说明的是：“修身”作为课程，只是日本旧制学校的科目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废止了。

那么，第一期“国定教科书”的“修身”课究竟是如何宣扬“皇国史观”的呢？

第一期“国定教科书”中的“修身”课本完全彻底地体现了日本政府的意志和“教育敕语”的精神。在这本教科书中，特别强调的就是“皇室中心主义”。关于日本的历史，“修身”课本主要讲述天皇的世系，包括传说的神武天皇、历代天皇、天照大神、皇后、楠木正成和楠木正行父子等。

神武天皇，在教科书中被作为日本开国的天皇。其实，即使在日本古代的典籍《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中，神武天皇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没有任何考古资料能够证明他的实际存在。在那些神话传说中，神武天皇被说成是神的后代，说他是从日向（日本地名）经海路移往东方，征服了大和，原宫即位。其即位

的时间，被推算为公元前 660 年。这种将神武天皇置于神与人的结合位置的传说表明了日本的统治者希望将自己置于神格的地位而强化其权威的努力，而将这种传说的人物赫然地写入教科书，并且是“国定教科书”，明显证明日本政府要把“神之国”的观念强制性地灌输到日本的儿童中，使其从小树立对天皇神明的崇拜，要利用教科书起到维护当代天皇统治的作用。

只要看一看被写入教科书的有关内容，就完全证明我们的论断。

在教科书中把天照大神作为日本天皇的祖神来介绍。天照大神本来是日本神道中的神，又称“太阳神”，是人们对太阳力量崇拜的反映。日本的统治者为了神化天皇的力量，就将天照大神作为皇室的祖神，称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而天照大神则始终在护佑历代天皇。在日本三重县的伊势，为天照大神建有日本最大的神社——伊势神宫。而天照大神的化身就是所谓的“八咫镜”。读过中国现代东北史的人也许还记得，日本关东军操纵的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在访日回来的时候，也曾经恭恭敬敬地迎回了一只那样的“八咫镜”，宝贝似地供奉在“建国神庙”里，引起许多人的私下议论。而在日本战前的教科书中，这种神乎其神、玄之又玄的天照大神就那样堂而皇之地被作为实际事物而肯定，让日本人从儿童起就接受“君权神授”的观念，借助天照大神进一步确立天皇的地位。

楠木正成和楠木正行父子也是“国定教科书”中被重点推崇的人物。他们父子二人是日本南北朝时期的豪族，著名的军事家，楠木正成在 1336 年的一场战争中战死。但是，后来的《太平记》的作者将其战死的过程故事化，特别强调他对醍醐天皇的忠诚，描写他在倒幕过程中的功绩，在南朝没落的时候至死仍忠实于天皇，并发誓“七生报国”。于是，楠木父子就成为在日本很有影响的“忠臣”的形象，在湊川为他们建立了巨大的墓地和

神社。明治维新前，倒幕派就以楠木为榜样宣誓孝忠于天皇。在教科书中以大量的篇幅颂扬楠木父子的忠君精神，当然也是为了在日本社会树立孝忠天皇的榜样。

在第一期的“国定教科书”中，上述事件和人物都被置于突出的地位，也就是说，先把天皇家的存在与作用作为整个日本历史的中心事件来描述，把维护“皇室的尊严”、忠诚于“天皇的神格化”、对天皇的“忠义”、“孝行”等作为国民重要的道德内容讲述和约束，在这一基础上，当代天皇的权威和地位也就不言自明了。

但即使是那样，“国定教科书”还是直接地要求学生当代天皇给予无条件的尊敬和服从。在小学二年级的“修身”课本中，有描写当代天皇作为大元帅检阅陆海军演习的课文，即告诉学生天皇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必须服从的。三年级的课本中又有关于皇后的记载，讲她到医院看望受伤和生病的军人，以显示天皇和皇室的仁慈，以使从内心建立对天皇的崇敬。

由此可见，对于加强天皇的政治统治和地位，对于推行“教育敕语”和建立“皇国史观”来说，“国定教科书”所起的作用是一切事物所不能取代的，日本的统治者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强化忠君教育的第二期“国定教科书”

第一期“国定教科书”发行后，立即成为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日本政治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在日本吞并朝鲜和对中国进一步推行扩张政策时候，教科书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那个时代的日本军人，大多都在学校中经过“皇国史观”的教育，他们相信天皇是无所不能的神，并甘心为之献身。

但是，随着明治天皇的死去和明治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同

时受到了世界性的民主潮流的冲击，国民的意识有所觉醒。特别是工人与资本家斗争的激烈化和护宪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天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感到第一期“国定教科书”对于强化“皇国史观”仍有许多不充分的地方，下决心进一步予以加强。于是从 1910 年起推出了第二期“国定教科书”。

与第一期“国定教科书”相比，第二期扩大了“国定”的范围，即不仅修身、国语、日本历史、地理、图画和习字等科由文部省编写，算数、理科和音乐也被纳入“国定”范围。这样，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就全方位地实施了“国定”制度。就是说，从这时起，日本的中小学教科书全部都由文部省编写，全国也只允许使用这一种“国定教科书”，任何人不能编写和发行其他的教科书。

第二期“国定教科书”更主要的特点则是将“皇国史观”的教育渗透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

在第一期的“国定教科书”中，“忠义”、“爱国”、“孝行”都作为优秀的社会道德，并列地加以宣扬。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是儒学的“忠孝”一体精神。比如，在这一期宣扬和表现的若干重要的“爱国美谈”，是放在“勇气”一课中介绍的。而在第二期“国定教科书”中，无论是何种道德精神，都统一在“忠君”的旗号下：“忠义”是对天皇的忠诚的献身；“孝行”是对天皇作为国民的家长地位的承认；“爱国”当然就是爱国家的主宰——天皇。所以，一切品行都被要求从属于“忠君爱国”的原则。原来定位于“勇气”的“爱国美谈”，在這一期的教科书中都定位在“忠义”上。

为突出说明“忠君”与“爱国”的统一，在教科书中特地以浓重的笔墨宣扬被认为是日本人楷模的木口小平、广濑武夫等军人和“水兵之母”等平民。

在日本，凡是经历过战争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木口小

平和广濑武夫这两个人以及“水兵之母”的“事迹”的，这与他们的事迹被记载在教科书里广为传播有直接的关系。

木口小平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中的下层士兵，担任号手。在日本军队中，号手是紧紧跟随军旗手冲锋在前的，战死或负伤的危险当然最大。木口小平在负伤后，仍然不放弃他的喇叭，用号声鼓动军人们的斗志，因此他的事迹被写进教科书。

广濑武夫则是日本军队中的中级军官（少佐），为了寻找他的部下而战死，在日本被称为“军神”。

“水兵之母”讲的是日俄战争期间的母亲鼓励儿子为天皇献身的故事。儿子应征入伍，登上了驶向战场的轮船。母亲送别时船只已经离岸，逐渐远去，母亲大声呼喊，叮咛儿子为天皇英勇作战。儿子在船上用鸣枪回答母亲的鼓励。

在这一期“国定教科书”中，“靖国神社”被作为教材而使用了。在小学的修身、国语以及音乐等课本中，都有“靖国神社”一课。例如：

东京的九段坡上，有一座青铜的大鸟居。在那鸟居的深处，是雄伟的靖国神社。（小学 4 年级国语。“鸟居”是建在神社前类似牌楼一样的建筑，多为木制、石制，靖国神社前的“鸟居”是青铜制成，高 28 米，号称“日本第一鸟居”）

樱花簇拥下的神社是何等威武，靖国的英灵啊，请你们安息。樱花有凋零的时候，靖国的英灵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小学唱歌第 4 册）

可见，靖国神社在日本的皇国教育和军国主义教育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靖国神社的前身是 1869 年设立在东京的“东京招魂社”，是专门祭祀明治维新之际为天皇战死的军人的地方，1879 年改为

靖国神社。为了宣扬为天皇战死的精神，特别是在战争中引诱大量的日本年轻人参加战争，在靖国神社祭祀的日本军人被称为“英灵”，抬高其在日本社会的地位，突出为天皇献身的靖国精神。靖国神社也写入教科书中，成为重要内容。在文部省制定的教材宗旨中，对“靖国神社”一课的教学有如下指示：

学习“靖国神社”一课，对于儿童理解“教育敕语”中“一旦有事发生，必须以义勇奉公的精神，保卫天地无限的皇运”，“在发生战争时，必须为天皇尽忠尽义，保卫国体”的指示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平时得到天皇的恩惠，得到在靖国神社中供奉的为天皇献身的人们的护佑，因此必须以他们为榜样。

在教科书中，供奉在靖国神社中的人物都被极力歌颂为“为天皇献身尽忠尽义”。虽然作为小学教科书，其内容很简单，但是由于配有形象的插图，语言生动，给学生都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而那些人物一旦被肯定或鼓吹，近代日本的专制统治和对外侵略也就被明确的肯定了。直到这些年，我们同经历过战争的日本老年人聊天，问起他们对战争时期教育的印象，许多人立即回忆起的就是那些事情，可见影响之深。在这里我们来看两位日本老人的认识。

一位老人是三尾丰先生，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战争期间，他在中国的大连当宪兵，曾经参与逮捕过中国的抗日志士。日本投降后，他在抚顺的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对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有很深刻的认识。1956年被释放回国后，他带着赎罪的心理积极参加促进中日友好的活动，并且十多次回中国向被他迫害过的中国人谢罪。在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共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在相互熟悉后，我对于他的从人变成“鬼”，

再从“鬼”变成人的经历相当感兴趣，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其中有几次涉及日本教育的问题。下面就是一次关于日本教育的对话。

问：从三尾先生前面叙述的情况来看，您作为贫穷的农民出身的日本人，在刚刚到宪兵队的时候，对于许多风气也并不是很习惯，但是以后怎么样了呢？

答：因为我也是从日本最下层和最贫穷的地方来的，我的家在日本贫困的地区——岐阜，没有多少土地，参军后原来也不过是普通士兵，开始的时候并不习惯宪兵对中国人甚至对日本士兵那种颐指气使的样子，可是逐渐就习惯了。记得1938年在牡丹江的时候，有一天负责车站治安和防谍的宪兵发现一名行动可疑的男子，在对他审讯时他还企图逃跑，就把他逮捕后带到宪兵队。那时我是班长，就对他进行审问。因为他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让翻译用竹板抽打他赤裸的后背，他仍然不说，又抽打他的臀部，但他还是不说。这样折磨了他两天后，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情报，不肯服输的我就让宪兵把他的手脚绑在凳子上，拿火烧他的脚心，可他就是不说，我终于没有办法了。后来又扣留了他一段时间，不得不把他释放了。他走出宪兵队的时候，身体摇摇晃晃，我想可能要残废了。

问：我以前从许多书中知道日本宪兵的行为，也听被害人讲过受害的事实，但是直接听当过宪兵的人讲自己做过的那些残酷的事实，这还是第一次。记得有人说过：不管是什么人种，也许在战争中是最容易复归于野蛮性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战争中都复归野蛮，那么，日本军人，特别是日本宪兵的野蛮性，究竟是如何造就的呢？

答：先生问的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也是我在成为战犯

后在管理所中经常思考的问题。我决不想回避自己的罪恶或责任，但是从根源上分析，我认为那与我们从小接受的日本社会的传统教育有密切的关系。

现在思考起来，日本当时的教育是在力图创造一种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和对亚洲各民族的蔑视。而日本优越感的基础则是天皇制度的神国。

我清楚地记得，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课本上就有介绍在甲午战争的战场上日军的号手英勇作战事迹的课文，题目是《木口小平至死不放他的喇叭》。在三年级的课本上，有《市太郎》一课，说的是日俄战争期间一位老婆婆到港口送别她出征的儿子。轮船已经启锚离港，离岸越来越远了。老婆婆大声高喊：市太郎，不要管妈妈，要为天皇建立功绩！船离得更远了，听不到市太郎的回答，但是甲板上响起了枪声，这是市太郎在向妈妈宣誓。在五年级的课本上，有介绍广濑武夫为寻找部下而战死被称为“军神”的故事。类似的内容充斥当时的课本之中，让我们从小树立为天皇战死是最光荣的信念。那时的学生在进入学校时，都要向天皇的“御影”行礼，背诵天皇的“教育敕语”，入伍后就背诵“军人敕谕”。那里面都是说日本是伟大的神国，从来没有失败过，要为光大日本而奋斗和献身。对于我们这样文化程度低的学生或士兵，在一片空白的脑子里，充斥的都是那样的内容。这是我们作为日本人特别容易在战争中暴露野蛮性的重要原因。

不仅是日本的军人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平民，也有同样的认识。

比如，我还认识一位积极从事和平运动的日本友人冈田黎子女士，她是一位美术教师，今年已经 72 岁。她在中学一年级的

时候，曾经被征用到当地的兵工厂当少年工，参加了气球炸弹的制造。由于听说那种炸弹在战争中伤害了美国的儿童，她有很强烈的赎罪感。为此，她把自己在兵工厂的经历画成画册自费出版，赠送给从事和平运动的各国同行。她在了解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后，灵魂更受到极大的冲击。她在同我谈自己的感受时，也特别提到了战前日本的教育：

我刚一入学，一年级的国语课本上就有这样一篇文章：“前进、前进、军队向前进”。不久，日中战争就开始了。上五年级的时候，小学校改为国民学校。到 12 月开始了太平洋战争。军国主义的教育更加强化了。具体的表现是：在学校中以神国日本的现人神——天皇的“教育敕语”为根本，强调对天皇的忠、义，实施思想统一的愚民化教育，这些都贯彻到学校生活的全部和全体学生中。

在学校的校园中设置“奉安殿”，其中供奉着“教育敕语”。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和新年这四大节日时，校长、老师都穿着制服，戴着白手套，把锁在桐木箱子里的“教育敕语”恭恭敬敬地运到会场，由校长严肃地朗读。平时学生们上学、放学的时候，都要向“奉安殿”行礼。

除了雨天，学校的操场上每天早上都举行“朝礼”，吹奏“君之代”的乐曲，升“日之丸”的旗帜，向着皇宫的方向“遥拜”行礼。校长在训话的时候，每当提到“天皇陛下”的时候，全体学生必须一齐立正不动，走神的学生就会被老师打耳光。上午课程结束后，下午要进行队列训练。六年级以下的学生徒手进行，中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则拿着代表枪支的木棍、竹竿进行。

在各种教育里，也有天皇制的军国主义教育。如“修身”课，就是贯彻“教育敕语”，教育学生要成为为国家、

为天皇尽忠的良民；历史课宣扬天皇是神的子孙的虚幻的神话，讲述天皇的系谱，把神格化的天皇作为现实让学生接受。在国语课的教科书中有这样的诗句：“日本列岛大和魂，清晨开放山樱花”，对这句诗的注释是：“山樱之花开放的时候一起开放，凋谢的时候一齐凋谢，这就是日本人的象征。顾惜生命的人是卑劣的人。”还有那样的话：“在海上战死就葬在海里，在山中战死就埋在山上，只要为天皇献身，就是死得其所，决不后悔。”这时候，英语被认为是敌国的语言，是不能讲授的，但是有刀术一类的课。

从两位日本老人的体会，我们不难理解战前的日本教育是如何影响了整整几代日本人的思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三期“国定教科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正是日本的所谓“大正民主”的时期，民主之风当然也吹进教育领域。但是，在专制主义的教育根深蒂固的时代，在“教育敕语”依然被作为教育的最高原则而奉行的时代，在“皇国史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大正时期的民主潮流在教育界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可以说基本没有触及天皇制教育统制，“国定教科书”的制度也丝毫没有变化。这一时期所谓的新教育，只是在教育方法的技术层面上做了些文章。这也证明了当时的天皇制在日本社会具有的相当强的社会基础和力量，民主势力无法与之抗衡。

1918 年开始，第三期“国定教科书”开始使用。由于大战的影响，日本更深地介入国际社会，教科书不能不面对这一现实，所以增加了一些反映世界形势和现状的内容，如在课本中增

加了“上海”、“美国通讯”、“欧洲之旅”等内容，国际色彩较以前有所增加。但是这并不影响教科书继续鼓吹天皇制国体和日本走军国主义的道路。因此，在这一期教科书中，为强化“神之国”的观念，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如“神风”等，鼓吹军国主义的色彩更加浓厚。

“神风”，在日本是一个具有特别涵义的名词。因为日本是多暴风雨的岛国，所以在国民的意识中，对于风一直抱有相当的恐惧，因此也衍生出对风的景仰。在科学不发达的蒙昧时代，人们把飓风看成是对不遵从神的威德的惩罚，产生了许多传说。特别是在 1274 年和 1281 年，当时的蒙古大军在征讨日本的时候，船队在博多湾两次遇到飓风遭到覆灭。在航海设备不完善，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本来是很常见的现象，但也正好为日本的统治者利用。于是便生出了“日本得到了天神的庇护，天神以飓风惩罚蒙古军队”的神话故事。“神风”因此得名，而日本也与神风结下了缘，成为“神风”始终保佑的对象。作为神话传说，“神风”这一概念来源已久，而把这样的传说正式写入教科书，而且是“国定教科书”，则是从这时开始的。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使日本人从儿童时代起就培养起“神之国”的信念，建立起日本是“神风”始终保佑的天皇制国家的信念。

如果说“神风”的教育在平时是培养了日本人从小的“神之国”意识的话，那么，在战争时期，“神风”教育则直接转化为军国主义的行动。这一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很抽象，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则很容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的侵略行动遭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形势日趋紧张。日本政府和军队于是就祭起了“神风”的旗帜，在日本的陆海军及海军航空兵中建立特别的攻击队，让飞行员和海员驾驶装满炸药的小型飞机、潜水艇向对方的军舰或目标进行自杀式的绝望的攻击，这样的攻击队就被命名为“神风特攻队”。他们使用的飞机被称为